

巫靜宜

從傳教到漢學啓蒙

淺述十七至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與中學西傳

歐洲的漢學研究，法國不僅是發源地，更有其優良傳統。法國國家圖書館這個典藏圖書的寶庫，自然提供了法國以及西方漢學研究的重要來源。館藏中豐富的漢文圖書文獻，除了來自探險家、學者及商旅到中國取回的一手資料外，另一部分是由明清初耶穌會教士帶回的。本文試從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切入，探索他們對中學西傳的影響。

來華的法國傳教士

在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的撞擊與交流媒介是以入華耶穌會士為主體的西方天主教傳教士。他們無論是在中學西漸方面，還是在西學東漸

領域中，都做了許多有益且他人無法取代的工作。

法國耶穌會士來華傳教開始於一六一〇年，剛開始來華的耶穌會士中很少有法國人，但自從一六八五年

法王路易十四開始派遣傳教士起，法國籍的會士便成為耶穌會士的中間力量。一六八七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五名精通天文地理和數學的耶穌會士來華，並在出發前給予「國王數

學家」的封號。傳教士們浩浩蕩蕩攜帶大量的書籍與儀器前來，形成有規模、有組織的傳教團來華傳教，他們是直接由法國政府而非羅馬教廷所派遣的。這種轉變最主要的關鍵是：法國想在東方發展勢力。事情發展的起因是在一六七八年時，中國教區因為缺乏傳教人才，因此擔任中國修會副省會長的南懷仁隨即派遣在華傳教的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前往巴黎爭取法國政府的支持。而這個舉動正好符合法王路易十四想要利用法國傳教士到中國來擴張法國勢力的意圖，並且急於介入葡萄牙對東方教務的壟斷。因而順勢派遣一批代表法國國王的耶穌會士，並由政府負擔耶穌會士的旅費和年金。由於傳教活動有國家支持為後盾，加上民族主義的驅使，耶穌會士們便很自然地接受以國家的利益為要的想法。因著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熱潮湧現，人數大增後，使得這些傳教士在十八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扮演重要的角色。

根據何諧的文章所述，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可分為兩階段：從一五五二

年到一六八七年為第一階段。主要以義大利、西班牙傳教士為主流。此階段的活動著重在傳教事務，對中國的考察和研究只是傳教以外的一個業餘活動。但從第二階段一六六九年到十八世紀末，主導的是法國傳教士。與第一階段比較之下，法國傳教士已經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的研究上，漢學研究變成重要的職志。因此，中學西傳的歷史氛圍對法國傳教士而言相當的積極而且熱切。

中學西傳與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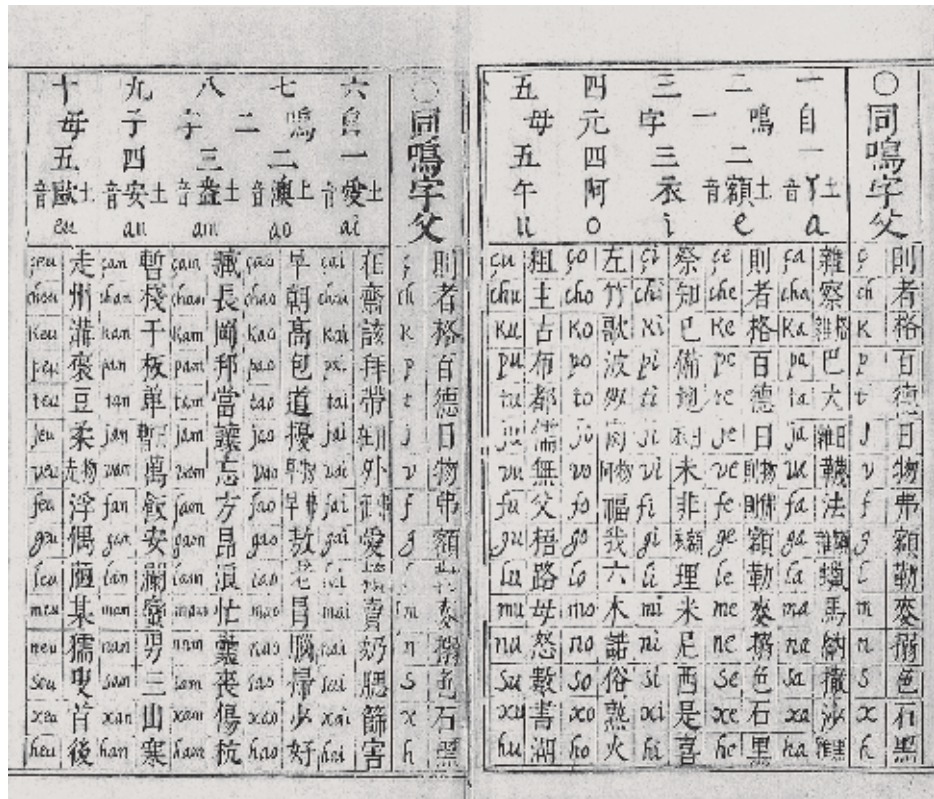
基本上，法國耶穌會士透過三種方式將中學西傳：一是直接攜帶中國書籍回歐洲。由於這些典籍的輸入，使歐洲漢學研究由義大利轉移到法國。其二是直接翻譯漢語典籍。翻譯中國學術經典，是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傳教「文化學習」策略之一。其三，介紹中國文化學人的思想和文化。

上述的方式無論是書籍的平行輸入、翻譯典籍、還是文化介紹的書寫，這些書籍傳到了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都是被珍藏與研究的！

十七世紀漢文圖書的入藏

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漢文圖書入藏紀錄，最早是由路易十四的首相馬札漢收藏的漢文書冊開始的。在他過世後隔年，由大臣庫爾柏把馬札漢收藏的漢文書籍轉到國王圖書館（Bibliothèque du Roi，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收藏。再透過圖書的交換整理後，統計出有十九本的漢文書籍。然而，圖書館真正對於此類有收藏規模，要歸功於一六九七年耶穌會士白晉神父返法時，帶回康熙皇帝送給法王路易十四的書籍，其中有二十二種書目，含四十五箱、三百一十二裝訂成冊的儒學經書典籍，分別為：易經、詩經、書經、春秋、禮記、孝經、四書、孔子家語、性理大全、聖諭、大清律、資治通鑑綱目、廣輿記、武經、算法統宗、本草綱目、類經、說文、字彙、字彙補等。

白晉是法王路易十四於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第一批派遣到中國的六名耶穌會的傳教士之一。到了中國後，因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視，就留在清宮裡給康熙講天文曆數、醫



圖二 《西儒耳目資》 杭州 王徵
這本書是耶穌會士金尼閣在王徵協助與合作下，將利瑪竇的拉丁字母拼音法修改、擴充後，所完成的一本分析漢語語言書籍。這種語言系統是後來西方人學習中文的最佳工具，並成為傳教士和西方漢學家們所擬定拼音方案的鼻祖。當時在皇家學院和國王圖書館任職的傳教士就是用這種方法學習中文的。
圖像轉載自法國國家圖書館（BNF）出版《中國印刷》展覽圖錄

法國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九八年在廣州設辦，負責與中國的貿易工作。當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漢文書籍典藏歷史進入十八世紀時，由於中國地區的法國傳教士數量增加，透過了貿易的管道，陸續進行重要的購藏運回法國。這促使皇家圖書館漢文書籍典藏內容與數量逐漸的增加且多元化（圖一）。此時期在華耶穌會教士的購藏者中以馬若瑟神父、錢德明神父為代表。然而，這些在華傳教士們並非單方面的購藏，而是與法國本土的政治家、學者多有聯繫。這些身在法國本土的知識分子們，或是從傳教士發回去的大量見聞和報告中瞭解中國、或是從帶回來的中國冊籍中得到資料、並與傳教士保持書信往返，以獲取關

法國是無人能懂的語言，白晉明白在當時的法國，承載中國文化的書籍是備受重視的。因為路易十四曾在 一六八四年寫給葡萄牙大使的信中曾

說道：耶穌會士被派往中國的使命除了研究天文外，是爲了「找尋最奇特的中國書籍」。在十七世紀的法國，興起對儒學論述的研究與出版熱潮。

傳教士與文化交流

法王路易十四醉心於楓丹白露宮裡的中國瓷器，認為能製造如此美麗藝術品的民族，一定具有燦爛的文化。所以，當白晉選擇中國經典來致贈國王時，就反應出耶穌會士們認為哪些作品是可以代表中國文化精髓。

學、化學等西洋科學。一六九三年由於白晉和張誠進奉奎寧並治癒瘧疾，獲得了賞賜，面諭白晉返回歐洲，令他在法國招聘幾位耶穌會學者來中國。因此一六九七年白晉以特使的身分回到了法國，並帶來康熙皇帝致贈路易十四的禮物。當時國王圖書館所

藏的漢文圖書非常有限，因此可想而知，當路易十四接到這些精美的漢文原版書，想必非常高興的。但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手抄本部東方處處長科恩女士的研究，這些由白晉帶到法國的書籍，很可能並非宮中所印製的欽定本，極可能是只是一

般的印刷版本。因為白晉離開北京時非常的匆促，因此未能即時向康熙帝呈報路易十四喜歡的禮物，這位法國人於是就在廣東購買了一系列的中國典籍，並以黃、藍綵緞裝裱後，以康熙皇帝的名義送給了路易十四。整個事件顯示出：即便中文在



圖一 《御製古文淵鑒》（清）徐乾學編
在白晉替康熙帝送禮給路易十四後，耶穌會士在中法的交流上日漸頻繁。在1700年的10月，洪若翰回巴黎的時候，也帶來康熙皇帝贈給法國國王的禮品，如茶、絲、瓷器和書籍。書籍中包含了這本康熙御選的古文佳作：《御選古文淵鑒》。從科恩的研究指出，這些洪若翰帶回的書籍顯然是康熙帝欽點的內容，因為書籍序末都有官方的朱色用印，證明書籍應該是在紫禁城的武英殿所印製的。（上）圖像轉載自法國國家圖書館（BNF）出版《中國印刷》展覽圖錄
（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馬若瑟神父在1728-1730年間購得《新鐫繡像西廂琵琶合刻》，並由畢農於1732年轉藏國王圖書館 圖像轉載自法國國家圖書館（BNF）出版《中國印刷》展覽圖錄



圖五 《元人雜劇選》（明）臧懋循編「桃花女破法嫁周公」 馬若瑟神父在1728-1730間於中國的江西省取得《元人雜劇選》，並將此書與購藏的漢文典籍給了畢農，入藏於國王圖書館。顯然的馬若瑟參考了元 雜劇的創作形式後，將元 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加以翻譯，並於1735年出版。 圖像來源：國家圖書館藏《戲曲小說版畫選粹》

在華的傳教士對於中國文化資訊取得的認知也有一些變化：在法國耶穌會士來華之前，歐洲的耶穌會士主觀上放棄了對中國純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尤其對於通俗文學更是興趣缺缺。但是法國傳教士卻認為中國文化的要義並不能單靠經卷資料的翻譯而

已，更要透過純文學或是戲曲小說的介紹來認識文化的內涵（圖四）。因此傳教士例如馬若瑟翻譯的元雜劇《趙氏孤兒》就被伏爾泰改編成《中國孤兒》在巴黎上演，不僅轟動了巴黎的戲劇界，更是讓十八世紀的歐洲看到中國文學的豐富。（圖五）

政治家柏坦和錢德明神父

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正是啟蒙運動興起的時代，講究理性與道德理想政治。啟蒙思想家為了獲取有利的支持開始在歷史和世界的範疇內搜尋

理論的根據。一些有識之士發現中國可以作為他們的楷模。柏坦是一位想以中國為鏡的一位政治家，當路易十五為法國七年戰爭失敗（一七五六—一七六三）感到憂心時，柏坦就建議應該遵行中國精神（l'Esprit Chinois）。事實上，這種想法在十八世紀中期的法國並不孤單，歐洲哲學家從德國萊布尼茲到法國伏爾泰都認為：歐洲的政治精英們治理國家應該在政治和社會制度上效法中國。柏坦在一七四〇年代的法國身分舉足輕重，除了與龐巴度夫人往

來，深具人文素養的法王法蘭西斯一世在一五三〇年建立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網羅人才、提倡學術研究。這讓皇家贊助學術成為法國的傳統，並在路易十四時期達到高峰。路易十四向來以集權統治著稱，並將文化的發展視為國家的重要

畢農神父和馬若瑟神父

於中國的一手資料。這些法國本土的文化接應者中：以畢農神父與傅蒙在法國的漢學研究初期有明顯的貢獻；而政治家柏坦對於和中國聯繫的看重，更讓耶穌會教士在傳教的使命下積極地進行中西文化交流！

深具人文素養的法王法蘭西斯一世在一五三〇年建立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網羅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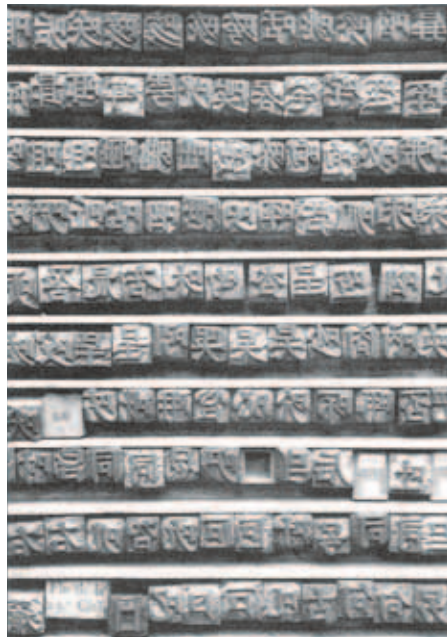
揮影響力。

傅蒙是第一位研究中國事務的學者，原本他所研究的是希伯來語言，但在在一七一一年就將研究重心轉到中文。因為就在當時他在國王圖書館裡認識一位會說法文的中國年輕人名叫黃嘉略，是一位曾參與外國宣教工作

此時，在另一端的中國，對西方漢學影響最大的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神父，有許多重要的著述與譯註，其中《詩經》選譯等作品在法國產生廣大迴響。他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記》堪稱傳世力作，內容主要涉及漢語語法、文學寫作等方面的知識。

觸的例子，在當時畢竟是少數。儘管黃嘉略後來英年早逝，他在巴黎文化圈所施展的魅力卻是顯著的，因為他成為了法國漢學萌芽的重要一份子。從法國漢學的萌芽來看，十八世紀的前期法國與中國的接觸是密切的。畢農和傅蒙畢生致力於中文字典與文法的編輯。但這種直接與中文接觸的例子，在當時畢竟是少數。

最大的貢獻就是為了他所編的字典刻製了八萬個中文字（圖三），這些印模今天還存在巴黎國家印刷局中。儘管黃嘉略後來英年早逝，他在巴黎文化圈所施展的魅力卻是顯著的，因為他成為了法國漢學萌芽的重要一份子。從法國漢學的萌芽來看，十八世紀的前期法國與中國的接觸是密切的。畢農和傅蒙畢生致力於中文字典與文法的編輯。但這種直接與中文接觸的例子，在當時畢竟是少數。



圖三 傅蒙的漢字印刻（圖像轉載自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Oriental & Chinese languages in 18th century France）

政策。在此前提之下，許多學術單位就由國家的經費來支付。因此當法國發展漢學研究時，研究中文的資源提供自然來自於國家圖書館。

十八世紀初任職於國王圖書館的畢農神父，位居眾學院的董事，及學者報（Journal des savants）的主任，畢農在十七至十八世紀法國的學術研究與發展是具指標性的人物。他於一七一九年被任命管理國王圖書館時，大刀闊斧地將圖書館管理的行政作業重新規劃，具體實施圖書館與大眾共享的願景。除此之外，他更鼓勵學術，並提供給法國漢學家傅蒙許多研究中文的機會。儘管來華耶穌會士對於中國語言文化的認識較為深入（圖二），但必須經過法國本土漢學家的再整理和傳播後才在歐洲真正發揮影響力。



〈二徒聞實〉



〈信而步海〉



〈天主〉

圖八 以上三圖，用於文章圖八：《程氏墨苑》（明）程大約編 明萬曆間程氏滋蘭堂刊本〈二徒聞實〉、〈信而步海〉、〈天主〉，錢德明瞭解中國墨譜原以上等的紙墨印製，堪稱中國書籍藝術的傑作，因此將這部書在1788年左右寄給了柏坦，並於1796年入藏國王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參考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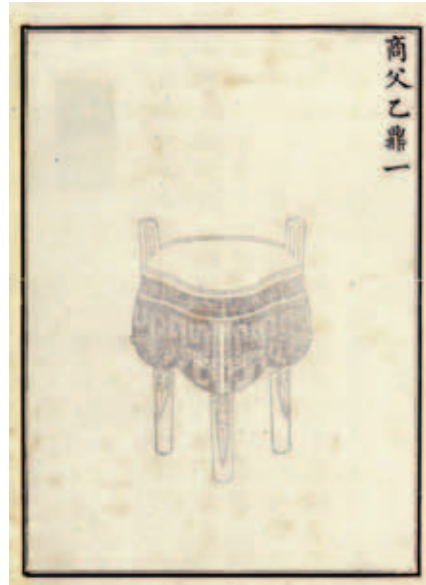
1. 法國國家圖書館網址 <http://www.bnf.fr/>
2. 梁育紅，〈淺析法國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活動及影響（1610-1773）〉，《懷化學院學報》，第26卷第12期（2007年12月），頁28-30。
3. 何諧，〈法國耶穌會士的中國研究及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攀枝花學院學報》，第24卷第2期（2007年4月）。
4. Gwynne Lewis, "Henri-Leonard Bertin and the Fate of the Bourbon Monarchy: The Chinese Connection",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Norman Hampson*, Ashgate Pub Co., 2004. PP. 69-90.
5. Cecile Leung, "Fourmont'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books Jean-Paul Bignon the enlightened leader", *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Oriental & Chinese languages in 18th century France*,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Impressions de Chine", PP. 129-145, 1992.
7. Thomas H.C.Lee (EDT), *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籍回國是一種普遍的情況，但博學的錢德明神父，這位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最後的會長，在中西交流的貢獻上實在功不可沒。

綜觀上述，十七至十八世紀來華耶穌會士除了傳教之外，對於文化交流的中學西傳有相當重要的貢獻。而其中法國耶穌會士在這個歷史洪流中，除了帶著宣教的天命來華外，還身負國家發展的託付。因著「學術傳教」策略的運用，帶來中西彼此更深層的文化交流。法國耶穌會士的研究儒學，讓更多的中國典籍或是以直

接帶入、或是以翻譯的形式介紹到法國。經過有識之士的努力與提倡，不僅為後來法國漢學發展打下基礎，形成了中國熱潮，進而影響到法國的啓蒙運動。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漢文圖書裡，在在記錄並印證著當時文化傳播的軌跡，讓人對十七至十八世紀中法交流的時空記憶有著按圖索驥的實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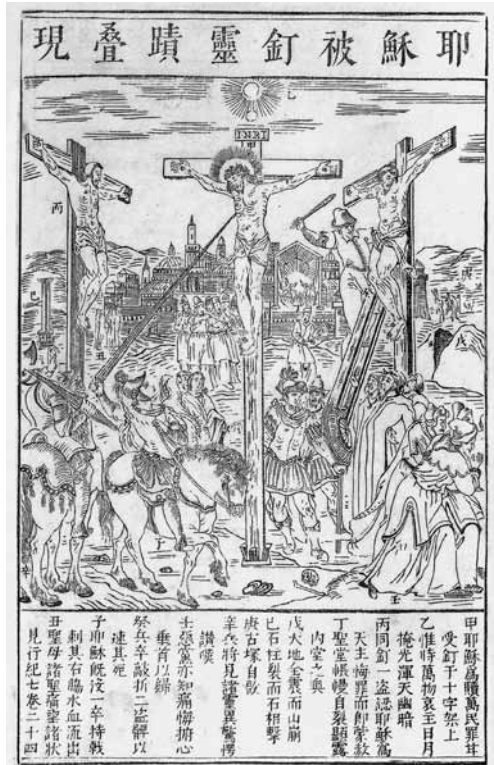
感謝本院圖書文獻處許媛婷副研究員對本文的建議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圖七 《欽定西清古鑑》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錢德明於1767年將《欽定西清古鑑》寄給柏坦，並大約於1796年入藏國王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來密切外（圖六），更於一七六〇年代躍身審計長的職位。他來自於天主教的家庭，並且在耶穌會士興學的學校就讀。對柏坦而言，他認為依循中

國精神就是應該將法國人對於政府的態度變成像中國臣民一樣的順服、忠誠。當時的柏坦極力想效法中國乾隆朝這個輝煌而開明專制的政治氛圍，以德行治國。他認為法國波旁王朝只要按照著這個目標前進，就可以重建戰爭失利後的頹勢。而借鏡的方法，可透過暢通的管道取得資訊。在中國方面與柏坦聯繫的重要來源之一，便是在一七五二年到北京傳教的錢德明神父。錢德明神父到中國傳道的八年後已經在朝為官，並擔任翻譯官的工作。和利瑪竇以及湯若望等前輩不同



圖六 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經解》 柏坦收藏。柏坦原是路易15及路易16時期的重臣，曾負責過東印度公司的業務。由於他對於中國文化的熱愛，曾經主導過《中國見聞回憶錄》(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es 1776-1814)的出版。這是由在華耶穌會士們於18世紀末所撰寫的文章和書信，主要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舉凡天文、礦物、植物、動物、科技和醫學等等，當然也討論到中國歷史書籍的相關議題。其中還有錢德明神父所取得的有關中國知名人物速寫的短篇傳記系列。柏坦與龐巴杜夫人交情甚篤，這些從中國所取得的資訊，便透過饋贈的方式呈給了龐巴度夫人，轉而進入國王圖書館的收藏中。柏坦對於該作品的喜愛明白的寫在書的機頁當中：「這是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所製作最為吸引人的作品之一，實為非常罕見而且奇特。」 圖像轉載自法國國家圖書館（BNF）出版《中國印刷》展覽圖錄

的是，利與湯的學術貢獻在科學的領域，而錢德明則是以中國文化的研究為主。由於錢德明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著力甚深，自然成為中國藝術文化訊息的最佳的供應者（圖七、八），並提供了十八世紀中期法國對於中國狂熱的知識供給。

柏坦在一七六〇年代與錢德明神父合作，透過書信的往來，以瞭解兩地的發展。柏坦在一七六五至一七九二年間與住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們有幾百封的文學書信往來。這些所謂的「文學書信」其實是為要避免讓外界有太多政治意識型態聯想所用的說詞。雖然中國與法國相距千里，藉由這些書信，柏坦得以了解到乾隆朝政經、社會與文化等的管理制度。無可否認的，柏坦所收集的這些書信對於法國十八世紀後期的啓蒙運動起了指標性的貢獻。這些包含了語言、文學、哲學、科學等的書信內容，連同許多的書籍、文章、回憶錄以及經典古籍譯本，透過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都一起進了國王圖書館。雖然十七至十八世紀法國傳教士陸續運送漢文書